

宁夏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

面向中亚—— 中国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

张永庆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

展现在面前的这幅力主向西开放、发展西北经济的蓝图，笔触明快，墨泽新颖，读后令人倍受鼓舞而神往于未来开放的广阔天地！

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震撼着神州大地。东部地区率先竞发，中部地区百业崛起，西部地区急起直追，祖国上下，一派生机勃勃，显现了炎黄后裔再创辉煌之活力，预示着新的世纪将是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

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连绵不绝地向人们提出层出不穷的新课题，要人们作出相应的回答。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向全世界宣告了今后 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光辉前景。其中，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关怀备至，格外重视。这对西部地区固然是恩泽，但同时也是鞭策。作为地处西北地区的我们，如何根据中央的建议，如何利用中央提供的机遇，同祖国其他地区一道来发展自己，实现共同繁荣，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宁夏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编审张永庆的《面向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郑重的回答：“面向中亚，走向世界，是中国西北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他以细腻、周详的文思，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中亚五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民族、宗教诸多领域，作了详尽、透辟的分析、研究、概括和论

证。一方面，充分肯定中亚五国在前苏联时期经济建设所获得的长足发展，指出其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与局势；另一方面，客观评价中亚五国与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渊源和近年来的交往及发展前景，恰当地分析其有利与不利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既使我们从中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又能增强我们与中亚五国发展经济往来，互补共进的信心。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不能重演，但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面向中亚》的研究，从历史上着眼于“丝绸之路”的兴衰，从现实中着力于振兴“丝绸之路”，形似重演，实质在于发展，它帮助人们看到：“西北地区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打开西部的通道。”大声疾呼要“重视中亚，面向中亚！”要“集全国之力，开拓中亚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社会科学院部分研究人员致力于西北地区向西开放的研究，余振贵研究员与张永庆合作的《大西北对外开放的新思路》、《中国西北地区开发与向西开放》已相继问世，后者曾获1992年度“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现在张永庆又献出了《面向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这篇佳作。当然，说佳作并非是说完美无缺，是无瑕之瑜。譬如，该书最后一章立意固然很好，但论证不够丰满，与整体相比，显得单薄一些，不能不说是一条缺憾。窃以为，欲求今日西北发展之道，必究昔日西北发展之轨。循古丝绸之路之轨，跨新亚欧大陆之桥，贯通西北与中亚之路，当是今日发展西北、发展宁夏的较好选择之一。然而，这一依托历史实践的理论研究之命运，却是不无抱憾。无论西北五省（区）的历届联席会议，或西北各省（区）有关领导的大政决策，虽曾一再提及面向中亚、西亚乃至整个中近东的问题，但实际动作与进展并不理想。对此，本人深为这一研究成果不得其效而焦虑，拟以《循古丝绸之路，走中东市场，发展西北区域经济》为题，从规律性认识和可操作性实践方面为已有之研究成果作些补充性、综合性工作，并敦

请有关方面不妨作些尝试,力求使向西开放的研究获得应有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再是泛泛空论而已。

《面向中亚》完成于 1995 年 12 月初,数月来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有新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① 面向中亚以至西亚及整个中东的认识是否正确可行,也应遵循这一认识规律,将理论研究引入实践,付诸行动,经过反覆再三,最终形成决策,则西北幸甚,宁夏幸甚。

《面向中亚》,先睹为快,并发了一番议论,这本是挚友之间的常事。不意永庆却因此执意相约为序,使我确感诚惶诚恐,不敢僭位。推辞之余,深有不恭之嫌。于是,恭敬不如从命,勉为所难,草就上书,尚乞同行同仁评点。

沙全一

1996.4.10 于宁夏自治区党校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40 页。

目 录

第一章 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

- 第一节 加速西北地区开发的新机遇 (1)
- 第二节 中南海心系大西北 (8)
- 第三节 以扩大开放促进西北地区的开发 (13)

第二章 独立前的中亚各国经济

- 第一节 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 (20)
- 第二节 前苏联时期的中亚各国经济 (24)
- 第三节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29)
- 第四节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34)
- 第五节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38)
- 第六节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40)
- 第七节 土库曼斯坦共和国 (43)

第三章 中亚各国独立后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形势

- 第一节 中亚各国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目标
和结构调整 (47)
-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51)
- 第三节 币制改革与“货币战” (55)
- 第四节 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贸易 (60)
- 第五节 转型时期严峻的经济形势 (68)

第四章 中亚各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秩序

第一节	趋向总统制的中亚各国政局	(75)
第二节	新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	(80)
第三节	代价沉重的塔吉克斯坦内战	(85)
第四节	令人担心的社会治安状况	(89)
第五章 世人关注的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			
第一节	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	(95)
第二节	“境外俄罗斯人”问题及其影响	(101)
第三节	中亚五国的宗教及政府的宗教政策	(105)
第四节	关于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和泛突厥主义	(112)
第六章 中国与中亚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第一节	中国发展同中亚国家关系的基本政策	(118)
第二节	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122)
第三节	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 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及塔吉克斯坦共 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127)
第四节	面向中亚的前沿和窗口	(136)
第七章 新亚欧大陆桥提供的新契机			
第一节	共同的话题——振兴“丝绸之路”	(140)
第二节	共同的希望——新亚欧大陆桥	(143)
第三节	新亚欧大陆桥与中国西北地区开发	(146)
第四节	新亚欧大陆桥与中亚	(152)
第八章 重视中亚 面向中亚			
第一节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155)
第二节	集全国之力开拓中亚市场	(160)
第三节	关键在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166)

附录一

中国哈萨克斯坦联合公报	(178)
中国哈萨克斯坦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两国 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	(180)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公报	(184)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关于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发展与加深互利合作的声明	(186)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发表联合公报	(188)
中国土库曼斯坦联合公报	(190)
中国塔吉克斯坦关于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 联合声明	(192)

附录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195)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附件	(199)
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外国投资法	(200)
关于实施《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 外国投资法》的决定	(205)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选摘)	(206)
后记	(215)
中亚五国地图	

第一章 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 西北地区的开发

第一节 加速西北地区开发的新机遇

1995 年的金秋，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在首都北京胜利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全面体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提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的宏伟蓝图，展示了今后 15 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光辉前景，是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长治久安，胜利跨入 21 世纪的宏伟纲领。

制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是以改革开放 17 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八五”计划的胜利实现作为基础的。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变，同时决定大规模地进行改革开放，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真正开始。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对外开放由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

区逐步向内地推进；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经济建设跃上一个大台阶，提前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入90年代，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八五”计划期间，在完成治理整顿任务的基础上，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由前10年侧重于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放权让利，转向以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制度创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市、县已超过1100个，形成了从沿海、沿江、沿边到内陆广大地区多层次、多形式和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抓住有利时机，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在所有制方面，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其次，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正在向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转变；第三，商品市场已形成体系，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也有了很大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第四，在宏观调控方面，由直接行政控制为主的方式，逐步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第五，在分配方式方面，初步形成了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转变。

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改革开放17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其中1992年到1994年这3年的增长率是最高的，年平均为12%左右。1995

年将增长 10% 左右。国民生产总值提前 5 年实现了翻两番，用 15 年时间提前实现原定 20 年达到的目标，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我国已与世界上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1979 年的 240 亿美元增加到 1994 年的 2367 亿美元，增长了 8.86 倍。其中 1992 年至 1994 年这 3 年的增长率都在 20% 以上。10 多年来，我国外贸总额由全球第 32 位，上升到第 11 位，外贸总额已经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39%，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协调供求比例的重要力量。16 年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签订协议项目共 22 万多个，其中 1994 年即达 4 万多个。到 1995 年 9 月，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累计已达 1054 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到 1995 年 11 月已超过 700 亿美元。与此相适应，居民消费水平则以每年 7% 的比率增长，1993 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 1978 年的 3.4 倍和 2.5 倍，城乡居民肉类蛋类食品的人均消费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彩电等家用电器在城市的普及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居住面积由 3.6 平方米增加到 7.5 平方米，人均寿命可达 70 岁左右。我国人民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实惠。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个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每个地区与自己过去相比，都有显著变化。自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而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的西北地区（主要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经济同全国一样，步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经济总体水平和效益创历史最高水平，群众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善。仅以“西北中的西北”、前不久刚刚庆祝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的新疆为例，全自治区工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制糖、造纸、皮革、食品、卷烟等门类齐全而又具备特色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自治区的农牧业生产又连续 17 年获得丰收，粮食生产从 1984 年起便自给有余，而且

外调他省。棉花生产在 1994 年就达 88.2 万吨，总产、单产、人均占有量均居全国之首。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从 1979 年到 1994 年，出栏牲畜年均增长 7.8%。1994 年，自治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已逾百亿元大关，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11.87 平方米，农村 16.3 平方米。据抽样调查，1994 年城市居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 108.15 台（其中彩电 81.85 台），电冰箱 61.67 台。家用电器也大量进入农牧民家庭。沿边开放已形成格局，外贸进出口总额 10.41 亿美元。新疆的基础设施也有了巨大的改观。目前，新疆铁路横贯东西，公路纵横交错，空中航线四通八达，亚欧陆地通讯光缆在新疆连通。新疆各族人民正意气风发地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样，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由我国自然历史原因和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东进沿海地区造成的。在古代，西北地区曾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有过自己的辉煌。但从 7 世纪到 20 世纪 40 年代漫长的 1300 多年间，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处于衰落状态。到 1949 年，全地区工农业产值仅有 28.56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为 23.08 亿元，工业产值为 5.48 亿元。在工业产值中，绝大部分是手工业，真正像样的现代工业是很少的。伴随着大西北的是贫穷、落后与荒凉。

建国后，为了消除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我国在 50 年代至 70 年代前期曾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即在全国有计划地合理分布工业，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和产品消费地区，同时着力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表现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地区分布是以内地为重点。例如，在 50 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 156

项骨干建设工程项目中，仅陕西、甘肃两省就占了 40 项。这种均衡发展政策虽然对开发中西部资源，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工业分布与资源分布不相称状况，维护民族区域的稳定和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人为地抑制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使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和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使东部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丧失了不少机遇，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二是国家对西部资源的开发与投入具有嵌入性特征，使现代大中型企业往往成为这些地区的一块“飞地”，使现代企业集聚形成的新兴工业城市成为一座座封闭隔绝的“孤岛”，不能带动所在地区城乡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把东西部矛盾转化为西部内地区间、城乡间矛盾，造成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的低下，表面上缩小了东西部差距，实际上导致了东西部矛盾的全面加剧和中外差距的更加拉大。实践证明，搞均衡发展不是解决东西部矛盾，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不论愿望多好，也是行不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种以效率为中心、向优势地区倾斜的政策，沿海地区投资比重上升，内地资源开发投资明显下降，出现了经济发展和布局由东向西梯度推进的格局。向优势地区倾斜政策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了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加速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区域经济的组织、发展能力增强，经济活力得以发挥，跨地区和城乡的横向联合加强，推动了生产要素流动和区域优势互补。但是，也出现了诸如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区际关系紧张、重复建设等新矛盾和新问题。在此期间，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拉大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我国生产力布局历史上就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按照国家产业垂直区域分工布局，加工主导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资源开发型产业

则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这种产业分工是历史形成的，并有一定合理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基础产业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致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部分效益外流。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未得到扭转。加之东部沿海发达省(区)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取得超前试验领先一步的优势，致使东西部差距拉大的问题突出起来。199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西部10个省(区)人均GDP^①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地区有6个，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的下中等收入地区有4个，这10个省(区)除新疆外人均收入都在全国平均数以下。东西部差距拉大的问题反映在西北地区更为突出。1994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675元，而西北五省(区)只有2577元；全国农民人均收入1220元，而西北五省(区)只有811元；按照新的“温饱线”标准，全国百人中有贫困人口6人，而西北五省(区)却有22人，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占西北五省(区)总人口的1/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西北与沿海发达地区人均GDP绝对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这构成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严峻挑战。这个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制约全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势必引发一系列矛盾，影响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

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然后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

① GDP指一个国家(地区)领土范围内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额。

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构想中，始终贯穿着两点基本思想：一是允许先富，鼓励先富，逐步实现均衡转变的思想；二是先进帮落后，先富带后富，照顾左邻右舍的思想。在这两点中，允许先富是基础和条件，照顾左右是保证和原则。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构想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既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摆脱了空想成分，着眼于长远和全局，通过以效率优先求发展，以充分发展来解决差距的办法，为从根本上缩小和解决东西部差距指明了方向。这一构想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也是缩小东西部差距、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新思路。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列为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和指导方针。《建议》指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李鹏总理在关于这个《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们从‘九五’开始，就要逐步加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力度。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三是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四是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五是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合作，鼓励向中西部地区投资。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和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国家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将会逐步增加。”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随着《建议》中提出的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和部署、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等的全面落实与逐步实现，不仅有力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将为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供了新的机遇。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为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繁荣大西北，展现出十分美好的前景。

第二节 中南海心系大西北

大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蕴藏着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国内外经济界人士预测，这一区域经济能量的释放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全面辉煌的“助推器”。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大西北。中国二三十年后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西北的发展，西北振兴是关系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战略大计。

充分发挥西北地区的优势，加快西北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可以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证，缓解国内原材料供求矛

盾；其二，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加强我国在国际经济分工及竞争中的地位；其三，对于我国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实施贸易多元化的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其四，对于改善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意义重大。因而加速西北地区的开发进程，就是下个世纪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帮助西北地区发展经济，改变面貌，成为党中央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选择一些内陆边境城市和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沿边开放的战略，把处于内陆的西北地区推向了开放前沿。这一战略凝聚着党中央对西北的厚望。

1992年6月6日下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同西北地区负责同志就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西北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座谈。李鹏总理勉励西北地区发挥各自优势，使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台阶；抓住当前机遇，扩大与周边邻国，特别是中亚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他说，西北地区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我们同中亚各国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西北各省(区)又有各自的优势，全国各地可以作你们的后盾，所以西北地区开展对外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合作搞活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快些。

1992年7月，国务院致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其类似沿海乃至经济特区的8条优惠政策与措施，要求新疆成为东联西出的枢纽和连接东亚与中亚、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的活跃区域。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西安、兰州、银川、西宁4个首府城市进一步开放，实行沿海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优惠政策。

1992年8月23日至26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参加了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西北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会议要求西北地区的同志以市场为联合的纽带，以外贸为突破口，联合起来“走西口”。要遵循“统筹规划，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有分有合，西出东联，面向中亚，扩大开放，发展市场，联合协作，共同繁荣”的方针，要搞大联合，大市场，大流通。

1992年9月1日至3日，李鹏总理对我国西部开发前沿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了考察。他提出，西北沿边地区有很好的地缘优势，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同中亚和独联体的其他一些国家发展经济技术合作。他说，西北地区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生产，进一步提高产品档次和水平。关键是改善能源和交通条件。他希望把新疆和西北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窗口和基地。

1993年6月13日至1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主持西北五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多种原因，东西部地区在发展上存在着差距。对此，中央十分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当前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几件带动西北经济振兴、影响全局的大事，并表示国家在政策上要继续对西北地区给予大力支持。

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一次突出了推动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内的中西部迅速发展的主题。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等一整套促进中西部开发的战略。会议期间，江泽民、乔石、朱镕基、胡锦涛分别到西北地区各代表团听取代表们的建议，并表示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将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力度。朱镕基参加陕西代表团座谈时强调，我国幅员辽阔的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